

“克隆一个鸡蛋？”

□金坚范

1998年4月初,中国作协时任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找我谈话,说郑伯农同志已超过任职年龄,由我接任《文艺报》总编辑一职。隔行如隔山,我是学英语出身,长期从事英语口语译和外事行政组织工作。在文学界“打工”多年,编辑工作一窍不通,写评论文章做梦都未曾想过,所以我当场予以婉拒。他锲而不舍又找我谈了两次,我是软磨硬抗,死活不从。逼到墙角里,我说:“这是要让鸭子下鸡蛋。”他迅即一笑:“现在不是有克隆技术吗,你就克隆一个鸡蛋吧。”智斗败下阵来,只能服从组织决定,走马上任。

《文艺报》比共和国的历史还长。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等前任领导人,无不是让我肃然起敬的名字。即使是后来的几位总编辑,也都是知名编辑家、评论家。忝任总编辑,实有狗尾续貂、滥竽充数之感。

当时《文艺报》面临三大困难。人际关系复杂,特别是社一级领导班子,总编辑、副总编辑、副社长共有9人之多。虽非“九龙治水”的局面,但人多嘴杂,各执己见。且《文艺报》员工才50人,领导占了9人,头重脚轻,比例失调。经过逐步调整,形成了一正两副的三人班子。经费严重短缺,稿费、医疗费报销常常拖了又拖,有时连下个月工资在哪儿都是问题。真可谓左右绌,捉襟见肘。文章千古事,苟且不得。版面好坏是一张报纸的关键之关键,恰恰在组

稿上又困难不小。

古人说:“欲戴其冠,必承其重。”王冠之重在于责任。既然“上得梁山”,便守土有责。按泰丰同志说法,我能否“克隆一个鸡蛋”呢?

好在《文艺报》有一个很好的集体。

无论是编辑还是行政后勤人员,他们“认庙不认神”,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水平的人并不嫌弃、心存偏见,反而是热诚欢迎,坚决支持我的工作。我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他们坦诚相告。有些人还未排上队,便迫不及待主动到作协办公室向我介绍情况。令我感动的是,有些私密的内心深处的想法,也不避我。

穷则思变,困则谋通。《文艺报》的工作人员,业务能力都很强,有些还颇有建树,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无论是在全体会上还是个别谈话时,要求从改革中寻找生机和活力的呼声,甚嚣尘上。情同乃聚,气合乃群。不满现状、从困境中奋起,大家思想一致、情绪高涨,是报社改革的前提和坚实基础。改革开放是国之大计,道大无外,也是《文艺报》的出路所在。顺势而为,我委托李兴叶同志主持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方案,以使大家各安其位、各展其能。改革的方向,根据两位副总编辑的意见,《文艺报》当努力成为在文艺问题上为中央建言献策的智库,在文艺界保持话语权。

1999年年底,方案几经协商,尘埃落

定,决定于2000年起改版。为纪念创刊55周年,2004年9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我一直保存着,因其第一版醒目地刊登着标题新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学艺术类全文转载量本报2000-2002年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于我而言,这一消息有特殊意义。

首先,这是我退休一年多之后的《文艺报》,是后任对我工作的肯定。2000年是改版第一年,当年就成绩骄人。在全国报纸全文转载量中,连续三年《文艺报》名列第三,屈居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之后,而在文艺类报纸中,《文艺报》稳坐第一。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公开发布的统计,具有权威性。最后,《文艺报》历史上第一次荣获全文转载量第一的桂冠。

记得2000年新年伊始,《文艺报》以《文学周刊》《艺术周刊》《作家论坛周刊》的形式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文艺界朋友、熟人有些打电话对我给予肯定,有些见面时当面赞扬。寿登九秩的“左联”老人、中国作协顾问林林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最近报纸办得好,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文艺报》这几年发表的文章,除了文学艺术界普遍叫好外,文化部办公厅、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资料室等单位,不时打电话来,要我们多赠几份某期报纸。记得2003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一

位同志私下对我说,《文艺报》有些文章为中央决策和思考提供了一些信息。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事涉文化主体性,在全国报刊中,是《文艺报》率先提出这一问题,且一时引起社会上热议。笔名杨鼎的批判前卫艺术的文章发表后,江泽民总书记高度评价。2001年4月初,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对我说,会上江泽民同志表扬了《文艺报》,他脱稿讲了一段话,全引用的是《文艺报》批判“前卫艺术”的文章。《文艺报》刊发的批判“文化台独”的文章,在全国报刊中可谓一骑绝尘,国务院台办两次在内部会议上表扬中国作协,《文艺报》走在前面。近几年台湾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凸显了批判“文化台独”的重要性。

顺便提一下,有些引起重大反响的好文章,是《文艺报》自己提出选题约稿的。例如,《文艺报》约请曾庆瑞教授撰写的《剽一剽褻读文学名著和经典的歪风》一文,发表后国家广电总局发红头文件,要求各地电视台学习此文。根据中宣部的要求,中国文联专门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此文。

追忆在《文艺报》5年的峥嵘岁月,虽非处处逢春,成绩骄人,但也不是乏善可陈。我克隆的鸡蛋,不知道泰丰同志是否满意?不管怎样,感谢泰丰同志对我在《文艺报》工作的支持。

已故《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有一句诗:“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想起当年《文艺报》的同事们,感谢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聪明才智成就了《文艺报》走出困境,体现了患难之交情谊深。想起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友谊,温其如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华诞。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文艺报》有幸同祖国一起过生日,因为它创刊于1949年9月25日。

70年前,我是一个学生,在重庆解放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当了30年的文艺兵,“文革”后,百废待兴,复刊不久的《文艺报》缺人手,我便申请转业,从海军调到《文艺报》工作。报到那一天是1979年6月9日,正是文艺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新人新作鸣锣开道的忙碌时期。

创刊70年,我在《文艺报》度过了40年时光。我来《文艺报》时已经49岁。不仅年龄偏大,而且是一个搞创作的,能做编辑吗?主编冯牧同志曾就我“改行”一事说过这样的话:“搞过创作的人来编刊物也有个好处,就是懂得创作的甘苦,对待别人的作品能手下留情,不至于乱打棍子。”这是对我的鞭策,至今不曾忘却。

1979年3月我去了一次北京东四礼士胡同《文艺报》的办公地,那是向文化部借用的两间房,十分拥挤。5月再去时,办公地点已搬到北京沙滩北街2号文化部大楼中,一部分同志在楼前的地震棚里上班。那天我认识了另一位笑容可掬的主编孔罗荪同志,分工艺术评论稿件的文椿同志对我说:“办公室里已经摆好了你的桌子,快来上班吧!”犹如一股扑面而来的春风,让我感到了温暖。

我到《文艺报》后,立即与文椿、杨天喜同志一起组成复刊后的艺术评论组。6月13日报社宣布召明同志为我们组的临时负责人,4人就在一个房间里工作了。召明是老《文艺报》人,文椿和杨天喜是多年同艺术界打交道的老编辑。他们对于我这个“改行”而来的老兵新闻给予了热情帮助、关怀备至。我们各自编完的稿件都彼此传阅,毫无顾虑地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或建议。艺术创作的门类很多,每人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分工,忙不过来时都是全组一盘棋,互相补台的。虽然1980年召明调往报社办公室,天喜同志在退休之后病故,但我们在艺术评论组结下的友谊是永存的。

到《文艺报》工作后,让我感到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学术空气的厚重与实在。每期刊物的编前会、编委会,都是从主编到副主编到编辑组,发行组、办公室全体人员都出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文艺界的重大事件、新作品的介绍、各种现象与问题的来龙去脉、主编的决策与组稿计划、读者对刊物的反应、编辑部内对重要问题不同看法的争论,都能在会上听到。参加这样的会,我总是感到新奇、激动而又收获满满。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短评是评论海政话剧团的话《为了祖国》。这篇题为《侨胞的心声》的文章共1700字,刊登于《文艺报》1979年9月号上,从看戏、读剧本,到写初稿,听取同事和领导的意见,修改完成,历时52天。

在《文艺报》当编辑,一大任务是要想方设法发表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评论家的高质量文章。我约名家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戴不凡先生的《〈大风歌〉小赞》共6600字,发表于《文艺报》1979年10月号上。为组稿计划的落实,我先阅读了陈白尘先生的话剧剧本,8月16日期间去人民剧场观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8月30日上午,我到戴不凡先生家中拜访、约稿,当时他正在家中病休。他同意写这篇文章,但又说看过剧本,未看过演出。当天下午我到二七剧场,代编辑部购买到9月1日、2日两晚的《大风歌》戏票30张。除了安排戴先生9月1日看戏外,报社的同事们也观摩了此戏。我托一位朋友从《红旗》杂志社资料室借来江苏省刊物《群众》1979年第3期,上面刊登了陈白尘《大风歌》创作经过的文章。此刊物于看戏时交给戴先生,以供其参考。9月5日上午,我第二次去戴家,他不在家,留下了《群众》杂志,让他的女儿还给我,并转告我:“一个星期交稿。”9月17日上班时,我见到了他托人送来的《〈大风歌〉小赞》一文的手稿。10月12日,读者在新出版的《文艺报》第10期上见到了这篇见解透彻、功力深厚的文章。不料想4个月之后的1980年2月18日,戴先生竟因心肌梗塞而突然去世,年仅58岁。3个月之后,我到华东了解戏剧创作情况,5月28日见到陈白尘先生,他感慨地说:“戴不凡的文章见到了,他还给我寄了一本《小说见闻录》,还没收到他就去世了,很可惜!”

作为一个编辑,如何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业余写作的关系?冯牧同志在1984年1月13日下午召开的编辑部全体同志会议上,做过一次语重心长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凡是走上编辑岗位的人,没有不愿意成为理论家、批评家的。许多大文学家都做过编辑。想当文学家、批评家,这是正当的愿望。但是要达到这一愿望,首先要学好编辑本领,使自己具有文字水平、理论水平、分析水平。年轻的同志应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成为一个熟练的、热情的、有分析能力的编辑。识别、判断作品的能力,这是永远不能满足的。”

我觉得,这是主编冯牧同志发自内心的金玉良言,愿以此作结,与大家共勉。

我在《文艺报》的点滴记忆

□李炳银



《文艺报》办公地点的变迁

□寒小风

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当时的办公地点在东四礼士胡同129号。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是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粉粹“四人帮”后这个院子由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使用。冯牧同志是文化部党组成员、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文艺报》的主编。《文艺报》复刊后没有办公地点,他就从政研室挤出两间房作为《文艺报》临时办公地。此院是两个并排四合院,院子之间有走廊相连,后面是个小花园,有水池、亭子、花草。整个院子雕梁画栋,前廊后厦,精美雅致。《文艺报》办公室在东院,一间坐北朝南,编辑部谢永旺、召明、黄文珍、陈新民、李燕平和我在这儿办公;另一间南北走向的大房间,是陈丹晨、阎纲、刘锡诚、吴泰昌、郑兴万、雷达、高洪波、文椿、杨天喜等编辑的办公室。我们编辑部这间屋原来是于会泳的办公室,屋里铺着厚厚的浅色地毯,摆放有一大两小三个大沙发,卫生间有进口高级浴缸。我和李燕平、陈新民都是从兵团回北京的知青,李燕平是编务,陈新民是美编,我负责机要通讯和行政事务。在这个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办公,编辑部讨论研究的就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大问题。在那个时代,《文艺报》是文艺界的旗帜。

《文艺报》在这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1979年底,上

级决定将《文艺报》办公地址搬迁到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就是现在北大红楼后面的五四广场。当时广场的空地上盖满了简易两层办公楼,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艺报》,还有文联其他几个协会都在这里办公。《文艺报》在这里有两个办公地点,一个是《求实》杂志大楼5楼两间标准办公室和一间大办公室,《文艺报》的理论部、评论部、艺术部在5楼办公;还有一个是一栋两层简易楼,楼上是新闻部、小会议室,楼下是副主编办公室、编务、行政办公室和资料室。主编冯牧、孔罗荪在中国作协有职务和办公室。那个年月简易楼没有空调暖气,冬冷夏热,办公条件十分艰苦。单位没有食堂,中午我们就到文化部或《求实》杂志的食堂去吃饭。当时《文艺报》有一个好传统,每个月有一次情况通气会,会上先由最近从外地出差回来的同志汇报各地文艺界情况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再由主编或副主编传达中央对文艺界有关的精神、指示并提出《文艺报》下一步宣传报道工作重点。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文艺报》编了一份不定期出版物《文艺情况》,《文艺情况》一经出版就受到全国文艺界的好评,被称为“文艺内参”。在这期间,《文艺报》从月刊改为半月刊,又从半月刊改为周报,成了一份名副其实的报纸。从1979年到1987年期间,《文艺

报》一直在沙滩北街2号办公,办公条件虽然艰苦,但《文艺报》经常发表一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章。这是一个充满火热激情的变革时期。

1984年,中央批准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艺报》联合盖办公楼的方案,联合组建了基建办公室,开始时基建办公室人手不够,把我临时借调到基建办一个月。每天不是跑北京规划局就是跑建筑设计院,忙得不亦乐乎。大楼开工的时候,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剪彩仪式。大楼工地是在一片菜地上,周边除了农展馆就没有别的楼房了。那时三环路还没有全线通车,建长虹桥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儿。1987年大楼落成,当年8月《文艺报》搬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大楼,大楼第6层加上第7层的一个房间属于《文艺报》。当时没有搬家公司,我们从中国作协借来卡车,报社的年轻人冒着酷暑,一连搬了一个星期。从1978年7月复刊到1987年8月,9年过去了,《文艺报》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从1978年8月到2006年8月,我在《文艺报》工作了28年时间。在《文艺报》创刊70周年之际,写下一点我经历的《文艺报》办公地变动过程作为纪念。

我永远怀念在《文艺报》工作的日子!